

新文学评论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中国新文学学会 主办

- 安静的故事/张炜
- 重审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 诗人档案/朵渔
-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洪子诚
- 复旦论坛/阅读新世纪
- 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

2012 / 3
VOL.1 NO.3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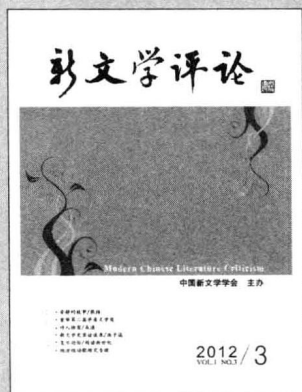
丁 帆 古远清 艾 斐 刘醒龙
张 炯 杨 樾 陈平原 陈忠实
陈思和 周健明 於可训 苗得雨
姚海天 洪子诚 阎 纲 黄修己
温儒敏 舒信波 蒋守谦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生 王彬彬 乔以钢 刘 复 生 朱水涌
朱栋霖 严 辉 何言宏 何 锡 章 吴义勤
张永健 张志忠 张清华 张 新 颖 李云雷
李建军 李遇春 杨 扬 杨 彬 陈公仲
陈晓明 周晓明 周新民 欧阳友权 南 帆
施战军 柳忠秧 洪治纲 胡 亚 敏 贺仲明
贺桂梅 赵小琪 郭宝亮 阎 志 阎晶明
黄永林 程光炜 谢有顺 熊 元 义 樊 星



新文学评论

2012/3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严 辉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作家语录

安静的故事

——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讲演 张 炜/4

重申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主持人语 贺仲明/12

史诗的沉浮

——漫谈《黄河东流去》兼及“茅盾文学奖”评奖 ... 刘新锁/13

历史的见证与价值的回顾

——以《钟鼓楼》为例看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李 伟/19

道德化的改革想像及其美学焦虑

——《沉重的翅膀》再解读 韦丽华/25

诗人档案·朵渔

主持人语 张清华/30

羞耻的诗学 朵 渔/33

“其实你的人生是被设计的”

——朵渔访谈录 王士强 朵 渔/37

有重量的写作

——论朵渔 王士强/44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洪子诚

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

——洪子诚先生访谈录 洪子诚 季亚娅/51

复旦论坛·阅读新世纪

主持人语 陈思和/61

新世纪文学中“无后”意象的来源 李 一/62

心理历史与文学的作用

——小议长篇小说《蛙》及《古炉》 汪雨萌/70

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

——关于贾平凹的《古炉》 袁一月/76

从“穿越”小说看新世纪网络文学 刘小源/80

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 李少君/84

江南诗人的超然与入世 张永峰/85

新时期天津诗歌概观 罗振亚/91

湖湘文化的诗性抒写

——当代湖南诗歌的整体考察 吴投文/97

海口诗歌印象 张伟栋/106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革命文艺的生产

主持人语 饶翔/110

革命文艺的“快感”大转移 司晨/111

作为新文艺风格旗帜的“农民作家” 卢燕娟/118

1958—1959年“工农兵”丛书研究 史静/124

作为社会生产动力的“饥饿”

——兼论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题材分类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 西元/131

学院风骨

关于路易士创办《火山》的几点史实 吴心海/138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不若歌谣谱出,讲过大众听闻

——黄世仲、黄伯耀《中外小说林》粤讴试解 施议对/143

抗战时期高校迁徙与教授的词创作

——以刘永济《诵帚词》为例 李剑亮/150

中国新文学在海外

鲁迅《野草》的梦幻叙述 [美]李点/161

学术交流

“周立波研究与文化繁荣”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仁宝/1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三)/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622-5748-6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

第 225752 号

责任编辑:古沁 冯会平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王胜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字数:300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2年9月第1版

印次: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安静的故事

——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讲演

◆ 张 炜

“安静的故事”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故事，因为它是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要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一个角色。

说到安静，我们会觉得这种要求越来越奢侈，除了极少数人，对一般人来说它简直是不可能获取的。从一个地区看也是如此，比如这座城市，就变得更加热闹了，生活节奏更快了。这里有一所著名的大学，十四年前来看，让多少人齐声赞叹，一片惊讶：园林别致，安静美丽，鲜花簇簇……这之前有人以为只有西方的名校才会这样，草坪，园圃，静谧和清新，整个大学的气氛都吸引你，你觉得在这个地方读书是最幸福的，在这个地方教书是最幸福的，来这个地方看一看也很幸福。

这所校园让我们有自豪感，并将这种感觉刻在了心里。那些没有看到它的人，算是孤陋寡闻。

可是现在，仅仅是十几年之后，同一所校园却变得人山人海，到处是拥挤的车辆，是小商小贩的吵卖，一片震耳欲聋。这里不仅不再是一座令人神往的校园，而且根本就不像是一座大学校园。这里只能让人惊异，让人想要快快逃离。

一般来说，一座历史悠久的大学校园会有很多高大的树木，地阔人疏，气氛中有一种肃穆感。这是由它的传统、由其中生活的人的气质与自然环境的气质一块儿合成的。可惜现在这样的校园已经难得一见了，它们大致上与喧闹的市井大街没有什么两样：车辆日夜穿梭，到了深夜三点还要把人惊醒，商铺林立。

记忆中的大学校园已经失去。它们被淹没在市场和人潮里。

一切关于大学的美好记忆只成为过去。在当今响彻南北的叫卖声中，大学的一道围墙实在显得太单薄了，它无法阻隔整个的世界（西方绝大多数校园虽然并没有围墙，却也是非常安静的）。

南南北北走一下，到任何地方，首先就是一个“吵”字把人裹住。去哪里都是人流如织，都是呼号之声震耳，根本没法安静下来。

可是人如果一直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剧烈旋转的浊流中生活，那会是十分可怕的。一天到晚被声音、被速度、被欲望追逐和包围，有再多的钱，再高的地位，都不会获得最起码的幸福，也谈不上做人的尊严。

有人认为吵闹混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十三亿的人口大国。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要超过我们许多城市，但那里并不一定像这里一样吵闹，比较起来可能大半要安静得多。

人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很多现代的喧嚣和繁华，比如纽约曼哈顿、拉斯维加斯等，好像那里更加热闹。人们不自觉间会把发达与热闹等同起来。但是美国的国土面积很大，它大量的城市，更不要说村庄了，都是非常安宁祥和的。人们在各自的地方安静地生活着。即便在这些西方大城市中，与我们比较，他们也是相对安静得多，比如其中的小环境还是安静的。

他们在自己的角落里做事情，互不打扰，即便是聚到一起，也会尽量保持一种安静的状态。

前些年发生过一个事件，就是有人在欧洲的某个

场所大声说话，对方一再制止无效，最后不得不将其驱赶出来……有人对此感到不解，认为欧洲人做得实在过分，自己无非就是大声说说话而已。好像如此。不过他们的确太吵了，并且已经习惯于这样吵，忘记了自己是不应该用声音打扰他人的。

在我们这里，到了餐馆里，哪怕只有四五个人在用餐，那么整个餐馆都不会安宁。即便是图书馆等需要安静的地方，也往往是人声喧哗。到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去图书馆、歌剧院，那里安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到声音。即便到餐馆去，即便是很多人在用餐，也不会弄出大的响声：每个人都会轻轻地挪动自己的椅子，用最小的声音交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侵犯别人的安宁，要给他人留下享受安静的空间。

如果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人却被肮脏的语言垃圾包围起来，那也不会有好的享用。

人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工作还是吃饭睡觉，无时无刻不被吵闹惊扰，没有一个地方、一个角落可以稍稍地躲避一下——这不是很糟糕吗？我们又将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二

我们的确已经没有地方能够安静下来了。到哪里去？到农村？记忆中的安宁之地已经不多了。农村也不是一个避风港——比如以前到胶东半岛地区，我很愿意到一些小山村去，因为那些地方交通不发达，入村后会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树，石头，河水，一切都保留在那种原始的状态里，安安静静地跟人对话。进入那个环境，就犹如走在一幅画里，人们愿意看它的树、它的石头和水，也愿意看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村民。他们的表情像他们的环境一样，安详、自然、亲切、和蔼；他们见到外来人，那种笑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非常纯朴；他们对陌生人的友善毫无做作。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偏僻了，村民们在这种自然安宁的环境里，心身养成了这样。吃这里的杏子、樱桃，那种愉悦和甘甜是从心里滋生的。

可是现在怎样？也许只是几年过去，再到那样的山村会看到什么？感觉完全不对了。人的神情不对了，他们对人不再那样微笑、那么和蔼。眼神有一点

警觉甚至是敌视。原来这里拉上了电视网络之类，路也修好了。与此同时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村风大坏。各种开发者一批批拥来，各色人等川流不息。

享用现代生活是人的权利。可是外部世界通过一根网络线和视频线送来的，又是一些什么货色？

我们全都明白，我们对电脑和电视上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绝不陌生。在海量的娱乐信息中，庸俗和拙劣已是家常便饭，因为点击率和收视率就是一切，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说到那个小山村享受现代化的权利，那也并不等于电视和网络，还应该有更多更好的内容。只送给现代的喧嚣和肮脏，这就把一个山村最好的东西给完全地摧毁了，比如他们不再相信人，比如村风的败坏。一个电视机一个网络，竟然能在两三年间就把一个村庄给改变成这样，可见它的力量是如此之大！那么我们可以问一句：现代通过网络和图像送达给整个世界的危险，究竟有多大？

就是一台电视机，就是一个网络，一根光纤，改变了这个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村庄。从一个村庄到一个社区，一个国家，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现实，就是进入了数字时代，电视时代。一切都在改变，无论接受还是不接受，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这都是一个事实，一个客观存在。它的出现让人类猝不及防。有时候我们觉得无非就是一些娱乐和广告，无非就是网络输送一些讯息，但是也就在这种日夜不停的输送之中，巨大的危险把我们覆盖了。

它的巨大毁坏力，比核武器来得更隐秘更长远，后果也更严重。它也许暂时夺不走我们的生命，但是却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另一种人。它有可能把我们全部的幸福，把我们美好的未来，在暗中窃取一空。这一切都是缓慢进行的，是隐隐发生的。它不会像原子武器那样，一瞬间造成血流成河。

它杀伤的是我们的心灵。

我们看一下现代如何加速：出门可以坐高铁和飞机，移动一只鼠标的分秒间接通整个世界，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什么生活我们都不陌生，千奇百怪的故事我们都会知道。再加上每个城市出现的各种各

样的小报、广播，所有人就在这样一个纵横交织的信息空间里活着。无论愿不愿听，愿不愿看，每个人都无可回避，都要在这种剧烈旋转和沸腾中存活。

这种加速度使人类失去了基本自然的平衡力，变得昏头昏脑，没有了准确的方向感和判断力。

现代人无法慢下来，无法获得安静，所以也就没有了深入思索的可能，更没有了感悟力，这是非常可悲更是非常危急的。

快节奏的生活给我们提供的方便只是一种表面的小利益——更大的更致命的剥夺却被我们忽略了。我们最终还要看综合的和最后的结果，问一句：我们获得了幸福吗？如果新的技术不能带来幸福，只是使我们变得更忙碌更焦灼，更浮躁更六神无主，这个新技术就是我们的克星。

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来遏制它和规避它。我们不得不思考现代技术带来的一切——它的功与过，罪与罚。

我们因为提速节省的时间好像很多，但是省下来的时间做了什么？没有用来寻找个人的生活、理想的生活，而只是一味模仿机器和技术，想像它一样提速再提速——在想象中像它一样快。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心实在是比网络还要快——我们总是嫌网络慢，因为我们的心已经飞了起来，比网络还要快得多。

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人类在各种技术的教唆和引导下，已经慢不下来了。有人说快有快的好处，慢了会急死人。所以我们总是追求用最快的速度从乙地到甲地，可以用最现代的工具，在一天时间里完成七天的工作。但是省下来的六天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在这六天里也没有慢下来，而只想更快，正在度过更加匆忙的六天——问题就在这里。

最后要问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快速旋转的生活里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

如果这样的角落真的存在，它会属于我们吗？不一定。因为心已经改变了性质，它现在已经慢不下来了。看来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先改变自己的心，让它安静一点。

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他看到什么就会学习什么、跟随什么。有时这种学习会是不自觉的。这些迅速在旁边跑来跑去的摩托、汽车，它们就在无形当中引诱

着人，诱人像它一样快，跟上它。网络引诱了人心，让人渴望无限地提速。我们的双眼每天看到的都是飞速奔驰之物，一颗心怎么会不跟随而去？我们又怎么能不去渴求快速的生活？

到处都吵吵嚷嚷，哪一个人不吵，对方就听不到他的声音。可见周边的环境对我们性格的形成，对我们生命的改造，是既深刻而又缓慢的，这种改造简直无时不在。所以我们说：风里面吹送的都是教导的声音，它正催促我们跟随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所以那个山村的美好宁静，人们脸上的那种笑容，说到底都是周边的环境给予的。所以要改变自己，就要改变环境。于是才提倡更多地到大自然里边去，去接受它的培育。我们总是看到挺立的树木，潺潺流动的河水，时间长了，就会变得和它们一样安静和坚定。因为我们也会学习它们，跟上它们的节奏。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山川大地的儿女，我们不是汽车摩托，更不是网络的儿女。我们要和诞生我们的那个环境相亲相爱，和谐一致起来，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利益。我们的生命是那片土地给的，所以才有“大地母亲”一说。我们要学习母亲：看树多了，就像树一样挺拔安静；看花儿多了，心情也像花儿一样。

有一个研究，说养猫的人身体好，首先是心血管系统好。这种研究有一个对比组，从中发现了一个规律：人经常和猫这一类动物待在一起，不自觉间，个人的生命节奏就与它趋同了。猫的行动是和缓的，人与之相处日久也就和缓下来了。

三

的确，猫是多么温柔和安静啊，可是一旦需要，它行动起来却像闪电一样迅疾。是的，还很少有一种动物像猫一样敏捷疾速。它跳到空中猎获，再落到地上，都不会失去平衡。可见最安静的动物在一瞬间爆发出的那种能量，竟是如此之大；可见安静只是积蓄能量的一个过程。

我们许多人到了关键时刻就没有了力量，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这种力量的积蓄。特别是思想的力量，它更是需要安静下来才能获得——如果人群吵吵嚷嚷积成一坨，所谓的人多热情高、力量大，什么人

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更多的只是一种愿望和神话。事实上许多时候恰好相反：个人才有力量，因为思想才有最大的力量。

任何高深的思想、能够影响世界和历史的思想体系，都是由个人产生的。无论是康德、孔子还是弗洛伊德以及达尔文，还有梭罗、里尔克和狄金森等等，只要是对我们世界发生了深刻影响的巨大思想能量，都来自个人。人多了只会吵成一团，产生不了深刻的思想。两个人可以商量事情，四五个人也勉强，几十个人扎堆就很难产生一条清晰的思路了。因为这时候没有了独处与安静，生命中的大能量无法缓缓聚集。

许多人愿意到大城市里去，到人多的地方去，享受所谓的人气。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人多的场所也是语言和思想最为平均化的地方。一个人只有退回到自己的空间里去，在沉默中，才能够好好地思索，好好地享受属于自己的一段时间。

时间这个东西会在匆忙中悄悄流逝。速度越快，节奏越快，时间溜走得也就越快。有时候我们觉得经历的某个事情就在昨天，可是扳指一算，那既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而是很多年之前的事了。因为现代生活的流速实在太快了，我们哪里还有心情去琢磨时间、享受时间、与时间耳鬓厮磨。

那一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因为涉及自己较多，所以印象还算深刻。这场长达两年、波及全国文化界的讨论，仿佛就是近四五年来发生的事情。可是仔细算了一下，准确点说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了。

整整十七年了。十七年可以让一个婴孩成长为一个青春少年，可以让一个中年人变得苍老。可是它真的就是一闪而过了。时间就是这样无情和快速，我们没有任何办法阻挡它。有人会说，既然以任何办法都难以让时间凝固，它总要以自己的节奏往前流动，从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就随它去吧。是的，但是如何随它？

时间具有客观性——但是时间却不仅仅如此，它还会在感觉当中存在，这时候的时间就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了。

我们回忆一下就知道，小时候的“一年”是非常缓慢的，可是到了四五十岁以后，“一年”好像缩短了十倍。这就是时间的主观性。因为我们的生命蜕化

了，它已经陈旧，视野里再无新事，外部世界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没有接受什么足够的刺激，所以一切都将飞快地被我们排除到记忆之外，不再咀嚼和享受它了。时间就这样失去了细节，它于是很快地溜走了。

有一对小城夫妇，孩子去一座大城市读书，毕业后就留在了那里。他们原来指望孩子毕业后回到小城，觉得这座小城生活质量高。可是孩子被大城市的热闹吸引住了，那儿车水马龙日夜不息，什么高档服装、咖啡店和摇滚乐，各种东西都在诱惑她。她最终找了一份工作留下了，有了爱人和房子，也算是个极幸运的人。她的父母到了那个大城市，发现人多得不可想象，到处堵车，到处轰鸣。孩子住的楼房有四十层，它的不远处就是高架桥之类。

这是一个日夜旋转的城市，整幢大楼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巨大的轰鸣里发抖。父母心疼孩子，问：你就在这个地方睡觉、过日子，就这样一辈子吗？孩子说是啊，我们住的地方还是极好的，我们已经习惯了。

父母听了以后久久没有说话，只有泪水在脸上流淌。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把孩子从嘈杂中拉回去，因为她已经习惯了，爱上了，也就是说，她的心已经变化了。她认为这就是现代都市生活，她正在享受这种生活。

父母回到了小城，从此却再也不能安心，因为一想到那个大都市的轰鸣、想到挤成一团的人群、在轰鸣声里发抖的四十层大楼，他们就难过得睡不着。

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小城的安静也只是暂时的，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坚持太久了，因为城市化的浪潮正席卷而来，各种所谓的“大开发”已经排上了日程。用不了多久，这座小城也要变得喧闹起来——总有一天，它也会变得像那座让他们流泪的大都市一样嘈杂喧闹。不仅是他们，我们所有人，都将找不到一个安宁之地。

我们不停地追逐物质，如果目标是那些发达国家，如果那才是我们的未来，那么这个“未来”有可能是太漫长了一——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大部分地区，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并不像我们这样，那里大致是非常安静的。

比如十几年前到过的一些西方小城,我觉得它是那么安祥美丽,从任何一个地方拍下来都是一幅画。在我们这儿的哪个景点拍照,那要好好选择角度和位置才行。可是到了那些美丽的小城,只要镜头没有拿歪,随便照下就是很好的自然风光片。这儿无论是图书馆、咖啡店,还有街道,都安安静静。汽车消音也好,它们基本上是默默来去,像这个城市的人一样收敛。

而我们这儿的车和人,却也是一样的:常常突然就爆发出脾气。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再去那个小城,发现它竟然一点都没有变。路还是那条路,房子还是那些房子,教堂的尖顶凝在那儿……一切都如同昨天,记忆中的那棵大树还在,房子的颜色依然如故,街道清洁得像被水一遍遍洗过一样。

这里给人的突出感觉,就是它的静谧与不变。为什么?可能这里的人和我们不一样,比如他们不那么浮躁和急切,做事情之前,尽可能把一切想好了再做。而我们的一些城市是怎样的?总是不断地改建,永远都是一副“百废待兴”的模样。“待兴”是将来和可能,而“百废”才是现在的实情。我们总生活在一座“百废”的城市中,这怎么受得了。

我们的城市,楼房和街道,今天这条路刨开了,明天那个楼拆掉了,后天又一个区域要改造;这个村庄刚刚扒掉,那个新区又在崛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苦干了也忍受了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不停地变革,不停地转型,那么多鼓舞人心的口号,那么多开拓型人士——我们的经验知道,一个地方如果来了一个开拓型的人物,这个地方的麻烦就大了。他们会让一个地方不停地折腾。

在一些时髦人士眼里,这恰恰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伟大时代”就该如此,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有生气,所谓的日新月异。可是恰好就是这种“生气”,让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到处都在吵闹,都让人灰头土脸,没有草也没有树——种了草栽了树,用不了多久就蒙上一层灰尘。四下都在刨,都在挖,都在拆。

为什么我们不停地拆和建,却没有弄出一座像样的城市?因为每一次都是对上一轮的否定,不停地否

定自己,又不停地犯下新的错误。显而易见,我们每一次并没有考虑好,总是匆忙急速地去做。

四

这样看来,慢下来,想好了再做有多么重要。世界上的事情有多少是因为缓慢而做错了?有多少是因为认真考虑而失去了宝贵的时间?没有,大多都是因为急躁、拥挤、吵闹,因为追求速度和虚荣才搞坏了。历史上的“大跃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荒唐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搞出来的。比如文化领域的革命,它尤其不应该那么快,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缓慢的演化和培养的过程,是和传统不能脱节的、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谁想在一两年里改变整个民族的文化,谁就只能去进行一场大摧毁和大破坏。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相应的时间,都要在相应的时间里完成它。

一些朋友到西方去,谈起对那里的印象,常常说那个城市漂亮极了,阳光好,海水好,城市街道好,人有礼貌,长得也漂亮,总之是溢于言表的兴奋。说到不好的方面,他们会说,那个地方的人太懒——比如总是在海边的躺椅上晒太阳,每天懒洋洋不太干活等等。这又会让觉得西方人实在太不像话了——但是后来想了想,又好像不对——人家那么懒,却能把城市建设得这么美丽!空气和水,精神面貌,都令人赞叹。这肯定不是懒人做出来的。

我们一直是以勤奋著称的,那怎么把环境搞成了这个模样?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大问题。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推理方法总结一下。比起那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我们更勤奋,而对方给人的印象是国民并不勤奋,更有甚者闲了无事又读书又写作,非常浪漫,还想当作家艺术家。他们喝咖啡聊天的时间不少,总是忘不了休息日、总是到教堂里去。但是他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我们还是高多了,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大概很难超越他们。

这其中的问题在哪里?推敲起来,无非是他们的无效劳动要少得多,他们更会利用时间。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先要好好想一下。这其实只是基本的道理吧。

而我们每天没白没黑地忙碌,哪有时间思考,一个劲地追求速度和效率,结果大量工作都是浪费了

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这种勤劳有什么用？它常常起到的不是建设和积累的作用，而是极大的毁坏和浪费。

勤劳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却不是一切。勤劳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读书是勤劳、思考是勤劳——坚持不懈几十年如一日地恪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仅勤劳，还需要意志。这些东西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我们的确到了该好好反思自己的时候了。

现代科技加快了生活节奏，增加了噪音，但这在不同的地区造成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还很少有哪一个地方像我们一样被现代科技所害。如果我们是嘈杂的族群之一，如果我们这儿是最混乱最拥挤的地方之一，那么现代科技的确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向。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残酷事实。

到发达国家的一些地方，到他们的家庭中去，就会感受明显的不同。他们家里有书架，宁静而温馨。这种气氛让人觉得有点异样和陌生，因为这个家庭的中心少了一个东西——电视机。我们这里是怎样？客厅里一般没有多少书，中央却一定有一个非常大的彩电。显然，电视才是全家的中心，它在引导整个家庭的生活。

五

对待电视的不同，看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但从这鲜明的对比中，却会发现很大的问题。我们实在是太爱追赶现代科技、太爱这种娱乐了，受数字传播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也太多了。我们听任自己在花花绿绿的视听世界里沉浮，时间就这样被无情地耗掉了。

打开任何一个电视台，它的节目往往都是十足吵闹的，有的还是相当庸俗的。比如开始的片头，总是伴随快速的音乐迅疾切换画面，给人一种数字魔术和飞驰的金属感。这加剧了人的急躁和不安，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我们的人性，我们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不能那样旋转。

电视、车辆、网络、电台，我们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在提速，就是这个提速弄得我们慌促和焦虑，我们既跟不上这种速度，又担心被甩在后边。结果就没有

了从容的生活，将日子搞得一团糟。谁如果想慢下来，对不起，周围的一切都不与你协调，不与你对接，一切的声音都在呼唤一个“快”字。

我们身边总是有一股呼啸而过的巨大噪音，这样下去，我们会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

比如我们将没法阅读，因为既没有了安静也没有了时间。看文学作品不能像看电脑一样快速浏览，它是语言艺术，需要进入它的语境，随着它的标点符号，语汇调度来享受创作的愉悦，来还原它的思想、它在产生那一刻最具有巅峰意义的犀利状态。文字是符号，它要人还原，要人思索和想象。

但是轰鸣和快速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已经不能正常阅读了。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在电脑前看各种各样的文字垃圾，这是数字浪潮推上来的花花绿绿的芜杂，他们一掠而过，因为既不可能也不值得看得很细。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不再可能理解高雅的艺术和绝妙的艺术，最好的东西被这个时代冷落，价值标准荡然无存。

一本书一杯茶是最幸福的生活。但这需要时间和心境——读书最过瘾的时期，也极有可能是一个生活最困苦、最为挣扎的那个时段，可见关键还是我们心灵的状态。

这需要我们痛下决心，在飞速旋转的当代生活中争夺一块属于我们个人的空间。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或许会发现，在这个时代里似乎存在着一个生存谋略：那些制造和催促我们飞快转动的巨大力量，与这个时代却是另一种关系。或者说那些有巨大资本或权力的人，可以将每个人都在飞速旋转的轮子上安一个位置，让其随它日夜不停地飞转——推动者是不会让这轮子慢下来的，而他们自己却躲在世界最安静的某个角落里，好好享受着自己的缓慢与安静。

这个世界的某些人，一些所谓的“胜出者”，他们一定住在那些最安静、绿色最多的地方。这些人歌颂速度，制造飞速的现代生活，而他们自己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环境里。如果说这是一种骗局或阴谋的话，倒不如说是一种天性，一种不自觉的、潜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对自身、对生命的保护力。这就生成了双重的生活哲学和生存格局。

那就让我们自己动手挽救自己、打破这格局吧。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我们一定尽可能抓住人生唯一的一次机会，去再次获得安静的权利。我们也要拥有自己的一杯茶一本书——我们改变不了别人，却要管住自己。也许面对纷纭复杂的现代世界，对付它的办法以及全部的奥秘，就存在于这两个字之中：安静。

寻获安静，要下最大的决心。

想起小时候曾经享有的安静，就觉得我们自己真是不幸，遇到了这样一个剧烈动荡、不是几十年而是好几十年的折腾生活。除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再就是激烈潮涌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整个社会喧声四起。我们现在只是追逐物质，其他一概都可以忽略，即使面对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遭受的巨大破坏也在所不惜，而且将要面临的很可能是一种万劫不复的后果。

记忆中的河流和森林不见，夜晚躺在树下枕着白色沙子看星星的时光完全消失。那时的星星一颗是一颗，那么明亮。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寻找那样的星空？

那样的星空都没有了，再多的物质拥有又有什么意义？

这种记忆只属于我们自己、个人？当然不会。

小时候住在一片林子里，孤独的时候就去最近的村子里玩。有一个少年伙伴叫“爱长”——因为他父母个子不高，所以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儿子身上，整天呼叫“爱长”，结果儿子像接受了魔力一般，果然长得很高很高。

“爱长”的重要的工作就是去放猪，那是一头小黑猪，很通人性。放猪就是把猪赶到收获过的红薯地和花生地里，让它寻找遗落的果实。猪的嗅觉特别好，哪里有食物它就在哪里拱土，而拱出的食物有时就被我们拿走。

我们最大的享受，就是一起放猪，还要占猪的便宜：把它找到的东西抢来，放到火里烤了吃。

有一次我们只在一边玩闹，玩得不管不顾，结果一抬头才发现小猪跑了。四周全是一片浓旺的丛林，是各种灌木，到哪里去找它？“爱长”哭了。跑走一头小猪可是一件大事，我们慌了。

“爱长”吓坏了，料定要被家里人揍一顿，于是拉上我一起回家。结果他一回家就被暴跳如雷的父亲狠揍一顿，连我也被捎带揍了几下。这时已经是天黑

了，但再怎么也要找到小猪。后来他们想起邻居家有一条叫花虎的狗，非常聪明，就借了出来。

我们一起到红薯地里去。

“爱长”的父亲提着桅灯，跟那条狗认真说了一些话：告诉它小猪是怎么跑的，请它将丛林中的小猪找回来，会给它很多好吃的，等等。花虎仰脸倾听，甩甩尾巴，一头钻进了黑乌乌的林子里。

半个小时过去了，花虎真的把小猪找回来了——我至今记得它从林子里走出来的模样：嘴里咬住小猪的一只耳朵，一边用尾巴频频拍打小猪的屁股，从紫穗槐灌木丛中把小猪乖乖地赶出来了。

现在想一下，我们拥有的“时间”就好比这头小猪，只有好好看住它才行，不然它就会溜走。我们不能过分地喧腾，如果无视它的存在，它就会跑得无影无踪了。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回忆，它大致在写“过去时”，记下了一些往昔事情，朋友的故事，那条河，那片海，写经历过的生活细节——这等于是把丢失的时间再找回来。

通过描述和回忆，咀嚼失去的时间——在这里，文学就好比是那条狗，即花虎，它能够帮我们把丢失的时间重新找回来，让我们像“爱长”一样幸福：拥抱着失而复得的“小猪”。

讨论：

传统文化的劣根/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安静的故事

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会把心慢慢淹死，让人的思考力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最后找不到我们自己。我们追求事业的成功，可是任何成功都要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它依赖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安静。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中国所谓的现代化的过程，就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安静的故事。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就是看能不能安静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劣根性，我们不能说自己被西方的商业主义改造了之后才变成了今天的紊乱，而肯定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面就有坏的东西。正因为有，所以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坏的东西就长大了，好的东西被扼杀了。

我们安静不下来，有一种对物质永不满足的欲

望，没有理性，没有信仰，庸庸碌碌，实用主义，这就是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劣根部分。过去一谈到自己的民族全是好话，什么勤劳勇敢之类——我们太勤劳了——可惜这劳碌只为了基本的口腹之欲，大脑却是懒的；至于勇敢，那倒不一定。

作者与象征/推荐书/经典和当代

我作品中的红马不是什么象征，它在书里一再出现，是因为作者心中的印象太深了。评论者愿意去寻找象征，寻找主题思想、反现代或者“理想主义”等等。但作者并没有太多的象征和主义，因为他要投入感情，写好人物和故事，要很朴实地去写。个人经历很重要，投入情感很重要。

每人口味不同，我推荐的书有一部分可能会令人失望，我在很多地方推荐书，让人觉得没有学问，因为不能推荐一点他们不知道的书。我总爱推荐一些经典著作。有人说，就不能推荐点闻所未闻的新书吗？这要确实好才行，新或畅销都不是标准。把经典读得烂熟更有意义，可能会重新发现一次经典。

有人总是以为自己很熟悉经典作家了，其实未必。经典的意义在于，我们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激动。这些作家之所以如此，成为千百年不朽当是有原因的。文字太有魅力，思想太有魅力，作家本人魅力无穷。

当然古典作家也不能取代那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时空下的当代作家。不过选择当代需要有一双好的眼睛，因为离得很近，没有时间的帮助，我们不太知道哪个好或不好，这就看个人的才华、感悟力，看目光的穿透力。杰出的当代作家也会创造出一个属于他个人的深邃世界。

有阅读癖的民族是打不败的/问题的核心

有人以为极大地富裕之后我们会安静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和自我安慰。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物质主义膨胀的劣根，这种劣根又与西方商业主义嫁接起来，于是不可能因为物质的增多而减少物质的欲望。一个重要的途径还是要提高整个族群的人文素质，拥有信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革命性的行动取代不了日常的学习，这种坚持收效较慢，却是真正有效的。

有人觉得中国 13 亿人口，素质提高起来十分麻烦，那也没有办法，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谁都想省事，想一天早上把所有积弊全部革除，于是就要爆发革命。暴力其实是很无力的，靠这种办法改变一个族群的素质，负面作用也很大。只有当我们的人文素质提高了之后，很多事情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想来想去，阅读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又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多读读书，也许比挣来金山银山更有意义。外国人谈对中国的观感，常常说到中国人不读书。这是我们的耻辱。有阅读癖的民族是打不败的。同样遇到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文盲是最没有抵抗力的。

说到物质丰富到了一定程度才会安静，这是虚妄之念。低劣的群体一旦拥有了更多的物质，就会干更多的坏事。所以说不要寄希望于物质的增长，要寄希望于人文素质的提高。强调培植一个民族的阅读习惯，致力于此，算是找到了问题的核心。阅读可以挽救一个民族。阅读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最简单的事情，最普通的事情，却是这个民族最迫切的事情。没有阅读就没有未来，没有希望，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彭文学评论

2012—4—30

主持人语

◆ 贺仲明

在已经结束的八届茅盾文学奖中，第二届是获奖作品最少的一届，一共只有三部作品获奖。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一届评选的时间范围比较窄。这一届评选的是1982年到1984年的3年间出版的作品，相对于第一届的1977年至1981年，第三届的1985年至1988年，时段都要短一些。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这是“文革”后中国文学的一个过渡阶段。第一届所评选的时段处于特殊背景之下，人们积蓄了10多年的热情在“文革”后突然爆发，就像“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集中的是10多年间被压抑的人才，其中所蕴含的能量远不是这几年的范围可以涵盖的。而在最初几年的热情爆发过后，肯定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的平静和调整期，之后，才会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期。第二届所处的时段正在调整期，它相对的冷寂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这一届作品的文学水准低。平心而论，这一届的3部作品基本上还是能够经得起一定的时间考验的。较之第一届的获奖作品，这一届的作品已经少了很多直接的政治立场感和概念化特征，文学本身的意识更强了。《黄河东流去》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作品，它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理念化色彩，但已经基本上沉入到生活当中，立足于人本身来看待历史、再现历史。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难得的。《钟鼓楼》也一样。它在艺术上很有创造性，将长篇小说的时间结构作了大幅度的浓缩，通过空间的拓展来展开。在“文革”后的小说发展上，它是有前沿性的。而且，作品完全回到平民视角，立足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叙述，对于传统的宏大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创新和发展。从文学史上看，《钟鼓楼》在一定程度上开启（至少是影响）了“新写实小说”的传统。

相对而言，《沉重的翅膀》是与现实政治关联最密切的作品，也呼应着当时正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改革小说潮流（包括当时更有影响的作品柯云路的《新星》等）。也许因为与现实太切近的原因，在今天看来，《沉重的翅膀》在思想意识和艺术表现上都有不少局限，但它也确实是那个时代文学的典型之作。而且，一个女作家写这么厚重宏大的政治小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比较有震撼力的。

这次来参与重审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三位作者都是出生于1970年后的青年学者，他们的思想背景应该都在这届文学奖之后，对于他们来说，这段历史已经是比较遥远了。审视历史，亲历者毕竟只能是少数人，而且亲历者既有优势也难免局限，后来者也因为历史的距离感，更容易在态度上做到冷静客观。具体到三篇文章，刘新锁的文章更具有宏观视野和历史高度，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阐释得相当透彻；李伟的文章侧重于对作品与时代环境的关联，将作品的获奖看做是与时代之间的契合；韦丽华的文章立足于文本细读，批判性地剖析历史环境在作品身上打下的烙印，并分析了作者所遇到的尴尬和做出的努力。也许他们某些方面的视野还略欠开阔，文笔也还有稚嫩之处，但我想，他们具有着“隔代者”的身份，带着年轻一代人的独特眼光，所提供的审视结果也许会跟我们这些历史亲历者不一样，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重新审视茅盾文学奖，也许能够带来某些新的启示。

当然，从更宏观和更全面的角度讲，我还是更期待对茅盾文学奖做历史还原式的重审。也就是说，除了对其文学性和文学环境等进行回顾，最好还能关注

（下转18页）

史诗的沉浮

——漫谈《黄河东流去》兼及“茅盾文学奖”评奖

◆ 刘新锁

1980年9月，茅盾病重住进医院。在病床上，自知病将不起的他留下两份遗嘱。其中之一，便是要拿出自己历年积攒下的25万元稿费设立一个文学奖项，“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这一奖项便是此后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影响深远并引致聚讼纷纭的茅盾文学奖。

显然，茅盾在遗愿中对未来的评奖标准做出了一定期许同时也是阈限。首先，便是要奖励“长篇小说”，这个标准应该说很便于掌握和具体操作；但其次提出的“最优秀”这一尺度却极为含混：究竟何为“最优秀”？尤其是在风云变幻极为迅速的中国当代文学界，各种创作潮流你方唱罢我登场，时时乱花渐欲迷人眼，在今天被众星拱月捧到天上的某一类型作品，明天便有可能沦为千夫所指而被弃之如敝屣。因而，尽管此后“茅奖”评奖委员会为评奖结果的公平、公正和公允做了最大努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除第一、二届评奖结果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较为普遍的认可外，此后每次揭晓后都引发争议不断，导致舆论哗然。甚至有时，评奖结果很明显是受到了各方面声音与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乃至出现为“找平衡”而将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各有侧重的作品杂置并陈相互搭配同获“茅奖”的情况——这样的评奖结果，引来的则是对评奖机制和评奖标准更为强烈的质疑、更为激烈的批判甚至是更为猛烈的“炮轰”。

当然，茅盾文学奖也并非没有自己较为恒定的评

判标准与价值取舍。中国作协书记处制定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修订稿）》中，依据正统的文学理论将茅盾遗嘱中提到的“最优秀”解释为“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在“思想性”方面的要求皆为老生常谈，此处无需赘言；有些耐人寻味的是其在内容上的要求。评委心中理想的作品应该是在内容上“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较好的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应该说，这一标准较为准确地呼应了茅盾本人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突出特色。我们都知道，茅盾在现代文学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正在于以文学的形式形象勾勒和描绘出了在中国大地上演的波澜壮阔的“现代史”，记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过程。茅盾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也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冯雪峰早在1952年便已指出，茅盾的创作开创了有别于鲁迅的另外一种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茅盾模式”；夏志清也提出，在宏大叙事方面，中国现代作家无人“能出其右”；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则将茅盾开创的文学创作模式称为重客观写实的“史诗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评奖条例的制定即便不一定完全吻合茅盾设立这一文学奖项的初衷，但与现代中国文学的“茅盾传统”在精神上还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来看，大多数获奖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体现了这一标准。也就是说，是否延续和显现了“全景、宏大、理性和客观”的“史诗性”叙事传统和艺术风格，成为历届评奖中作品能否获奖最重要的依据之一；而这些标准和依据背后，显示出的则是历届评奖委员会代代传承业已

根深蒂固的“茅盾传统”情结。虽然“条例”在表述中也提到要宽容和鼓励艺术上的创新与多样化，但评委们依然认为“多卷本小说在厚重感方面有自己的优势”^①——而从获奖作品来看也基本上是忠实于这一标准的：《平凡的世界》被誉为“诗与史的恢宏画卷”，《都市风流》“全景式又深层次地反映了城市改革的深化”，《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借人物命运演时代变迁，展示了三中全会前后农村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皆是因为显现了强烈的“史诗性”特征才获得评委们的认可并最终赢得奖项的。

下文重点要讨论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于1985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强烈的“史诗性”特征正是其当年被广泛称道并最终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黄河东流去》首先是一幅巨型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在这幅历史画卷中，融汇了复杂丰富的历史内容，笔墨在广阔多样的空间驰骋……李準的高明就在于他深刻地把握了这个史诗性：从纵的时间角度来说，以编年史的写法写了难民‘八年离乱’期间连续遭受三大浩劫的苦难的生活史。”二十多年后重读这部作品，我们依然要承认这一评价的准确。同时，如果我们将这部作品置放于更为开阔的文学史空间中重新研读，从其中似乎又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

二

《黄河东流去》的写作和出版时间跨度很长。上集于1979年印行，下集则出版于1984年，因此错过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1985年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开始，这部作品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评委的视野并最终得以得票第一名获奖。尽管这部作品在今天已是备受冷落^②，但时隔二十多年重读作品我们依然会发现，就那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环境与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和艺术水准而言，《黄河东流去》获奖应该说是实至名归。

这部全景式的长篇小说气势恢宏波澜壮阔，显示出极为强烈的“史诗性”特征。小说叙事视野非常开阔，展示的生活画面雄浑阔朗又多姿多彩，是一种典

型的“宏大叙事”。当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宏大叙事”的作品并不鲜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诗性”甚至成为当时长篇小说创作者们的自觉追求。无论是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还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等，“宏大叙事”都是其最为突出的叙事学特征。但重读《黄河东流去》便会发现，这部“宏大叙事”的作品与此前同类型的长篇小说相较而言，已经出现了质的不同。可以说，《黄河东流去》已经充分显示出了长篇小说叙事变革与过渡的迹象，其正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由一种“宏大叙事”向另一种“宏大叙事”转换的关头，并成为这种转换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基本采取的都是被政治视野笼罩和统摄的“宏大叙事”，受制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依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统理念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做出的形象化演绎。当时，绝大多数作家都是在政治热情鼓舞下，试图通过文学写作去验证现实政治观念的正确，因而，他们的思考与评价都是在既定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并展开的。他们的审美感知方式、话语方式与叙事方式始终都受到当时“共同文体”的限制与束缚，因而其“宏大叙事”几乎罕见例外地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样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状态下的写作，叙事空间的局促和叙事策略的贫乏自是理所当然。因而，很多作品尽管显示了“宏大叙事”的整体特征并被指认为“史诗性”作品，但很明显，创作者对自己描写的历史和现实其实无法做出超越性的思考和把握，作家的艺术敏感性和创作才华难以完全展现，导致这些作品徒具“史”的规模，“诗”的内涵却远远不足。无非是在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填充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扁平人物”形象，却缺乏鲜活的生命形态与富有诗意的细节描述，从中更是难以发现创作主体的个人情感与独特生命体验。

在《黄河东流去》中，这种情况便有了较大的改观。尽管也存在着“历史框架”大于“诗性内涵”的缺憾，但其叙事重点已从对政治运动与现实斗争的表象记述转向了对民族文化精神和集体灵魂的全面展

现。这种“宏大叙事”整体内涵的转向无疑会大大拓展小说的表现空间，并有效解放创作者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有助于作品向着更深厚的文化艺术空间进行深入开掘。应该说，这种转换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在“开头的话”中，李準说：“这本书的名字叫《黄河东流去》，但她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这些故事告诉我，我们这个社会的细胞——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何辉煌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③很明显，《黄河东流去》的叙事重点已经由陈旧的僵化的政治理念转向了民族文化精神、底层民众的灵魂与生命力这样一些在当时的文学界都比较新的理念与内涵。从小说内容来看，也是通过对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等的描绘，刻画了中原乡土文化心态，从而较深刻地开掘了中华文化的内核和精神，彰显了中华魂、民族魂。就艺术成就而言，《黄河东流去》实现了李準的艺术追求与文学理想。若还原到当时的文学语境来看，“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等文学潮流正大行其道，而这些与五六十年代和“文革”小说虽然政治指向截然相反，但却并未能摆脱陈旧的政治叙事整体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河东流去》的这种转向显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艺术创新敏感性与拓展文学表现领域的勇气与智慧。

三

若以当下文坛中涌现的优秀作品为参照来重读《黄河东流去》，其太多不如人意之处自不待言。比如，小说对人物的塑造还没有完全摆脱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阶级定性方式，描写显得有些呆板和简单化；再比如，作品主题先行的痕迹颇为明显，致使小说难以向着更为深广和复杂的文化、人性空间深入探索……这些局限性，使这部小说给人留下的是强烈的“毕竟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作品”的印象。

但李準对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乡村的生活方式，乡土地域性风土人情、人情世故以及农民的生存状态与心理、情感取向极为熟悉，因而写起来极为准确和贴切：这在其上世纪 60 年代的《李双双小传》甚至其最早的《不能走那条路》等作品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黄河东流去》这部长篇中，这些优势被他完全继承下来并得益于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而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与发展。前文已经提及，尽管小说整体上依然存在“史的规模”大于“诗性内涵”的缺憾，但《黄河东流去》对人物的塑造、对农民生活场景与心理状态的传达并没有很明显的概念化迹象与人为拔高的弊病，而是一切都贴着农民的实际情况来写，因而作品中不少人物都塑造得极为血肉丰满、鲜活生动，而叙事中对生活场景和具体细节的把握也极为准确传神，这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整体上的不足，从而实现了“精彩局部”对整体框架的有效“涨破”。这使得《黄河东流去》成为了一部具有很强可读性并且能够“抓住人”的作品，今天重读依然能给读者带来较为愉悦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这些精彩的细节和局部也有效地拓展与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心理与人性内涵。小说对农民语言、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的展示拿捏极为到位，并由此透过对农民心理与行为的描写揭示出了传统文化对普通中国人特别是乡村人物行为规范与价值审视、选择的影响和制约。这使得《黄河东流去》又不仅仅是一部好看的小说，还显示出了李準严肃的思考与更高层次的艺术追求，因而，作品在精神深度上也超越了当时大多数的中长篇小说，成为一部就那个时代来说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作品。

比如小说中对新四军初到赤杨岗情景的描述。在小说第三章写到，新四军进驻这个村庄后，迅速开展工作宣扬抗日发表演讲，并在最后带领大家高呼爱国口号——但小说中写到，他们的宣传不但没能让这些“庄稼人”随之慷慨激昂起来，反而让他们觉得“举起胳膊喊口号”“怪不好意思”，因而一开始虽有不少看热闹的人，但这时却“悄悄地溜走了”。这些生动、诙谐而又符合乡村生活真相的描写不仅不会让人觉得作者贬低了农民形象，反而更足以展示出农民身

上那种纯朴、憨厚的本性，因而使人感觉更为真实和亲切。

受制于当时文学整体环境与作者思想观念的时代性局限，与当时很多作品一样，李準在小说中设置了“贫”与“富”、“善”与“恶”、“上流社会”与“底层民众”等种种对立，形成了尖锐冲突着的两个世界。整体来说，这两个世界黑白分明，美丑殊异。但可贵的是小说并没有因此忽视现实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小说在歌颂与鞭挞不同世界不同阶层的人物同时，也用相当的笔墨写到了属于各自世界和生活环境中，每个不同个体的人身上蕴含的性格、心理乃至人性的含混与丰富性。“上流社会”多为非奸即恶之徒，其中既有为富不仁的海福元，凶残狠毒的海南亭，口蜜腹剑的孙楚庭；也有长期生活于这种骄奢淫逸的环境中却出污泥而不染、依然痴情刚烈恪守爱情约定的雪梅，有混迹其中却良知未泯善念犹存并最终幡然醒悟的海四圈。而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也并不全都是善良之辈，其中有李麦、海天亮、海老清等这样的正直、有道德、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的正面人物，其中同样有助纣为虐，帮助恶人骗乡亲们去东北出卖苦力甚至生命的胡陆理，有趁火打劫在大灾之中贩卖孩子赚取不义之财的人贩子，也有渐渐习惯于安逸的生活、善良朴实的本质日益消泯而变得势利、刻薄的老清婢……即便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样也存在着多个侧面的交织并存。比如陈柱子重视乡情乡谊又精明世故，王跑勤劳能干又不乏小小的狡诈，春义心地善良恪守传统道德却又偏执狭隘……

李準自己说：“在这本小说的人物塑造上，我也作了一些探索。那就是‘生活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十年一觉扬州梦’，我决不再拔高或者故意压低人物了。……所以在这本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了。但他们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还有缺点和传统习惯的烙印，这不是我故意写的，因为生活中就是那样的。”^④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早已是文学理论中的老生常谈，甚至会被认为是早已应该被超越和抛弃的陈旧观点。但这些话却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而且为了获得这样的认识，我们当代文坛上又曾经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李準写作《黄河东流去》之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历史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头，但其时文学上的种种清规戒律并没有失效，政治框架依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能对文学创作的经验和规律做出这样理性而明晰的认识，显示出了作家李準的清醒与开明；而能够将自己的认识付诸文学创作实践并取得较大的成功，更属难能可贵。

四

若将《黄河东流去》与此后当代文坛涌现的一些创作潮流和作家作品相互关联进行考察，我们还会发现，这部小说中描述的一些情节和作者的思考依然被此后的一些作家和作品反复描述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东流去》触及的一些问题其实是颇具生长性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具有了超越当时那个时代的范式性意义。

比如，小说用了不小的篇幅写到了作为同乡的陈柱子、老白夫妇与春义、凤英夫妇这两个家庭。他们同样是因水灾被迫离乡背井流落咸阳艰难谋生，他们本来相濡以沫亲密无间，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之间、甚至在一个家庭内部都出现了复杂的恩怨纠葛。春义、凤英刚刚流浪到咸阳时，陈柱子夫妇已经在当地站住了根脚，他们将一家牛肉面馆经营得颇为红火。念及同乡之谊，陈柱子夫妇热心地收留了春义、凤英小两口，并且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谋求生路：陈柱子雇用了头脑活络又吃苦耐劳的凤英帮助他们打点生意，同时还耐心地将自己的生意经传授给春义，悉心指点甚至亲自出面帮他卖菜赚钱。但时间一长，两个家庭之间浓浓的乡情厚谊渐渐出现了裂隙。凤英在陈柱子的牛肉面店依旧像过去一样勤恳能干，但因为自己付出的艰辛劳动与得到的微薄收入之间巨大的悬殊日益心生不满。于是，她时时处处留心，慢慢把陈柱子的烹调功夫学到手中并慢慢积攒本钱从而准备有一天能够独立门户。老于世故的陈柱子、老白夫妇看出了凤英的心计，也在情感上和心理上与凤英渐渐疏远。但与此同时，精明、开通而现实的凤英与倔强、保守却重情的春义这一对夫妇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在凤英看来，自己夫妇俩既然已经完全有能力也有条件